

■第一阅读

谁在缩短现实与梦想的距离

□李炳银

杨文学是个一直扎根大地,与中国基层民众有着很好沟通的作家。几年前,他用热情的笔触报告“苍山蒜薹事件”后的沂蒙地区苍山县农民,在新的生产种植和经营观念指导下,不找县上找市场,他们发展大棚蔬菜,开展蔬菜运输,从而直接地占领和影响着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蔬菜市场,写出了反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收入显著增长并逐渐富裕的《苍山三农》;用行走的姿态,沿着26年前300黔女下广州的打工路感受那些山妹子的心理历程,以凝思的笔法报告发生在贵州大娄山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大转移》,用深情的走访慰问,动心表达对战争年代无私并真挚地为革命付出了满腔真情的那些生活在农村底层而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们经历坎坷命运的《叩拜沂蒙》等,都是来自大地的激情和深思报告。这些生长在大地厚土上的文学根苗,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大地的变化和声息,产生出很多的欣喜和思虑。这些包含着激情和深思的作品,都充分地说明,杨文学是将自己融入到现实的社会感受和思索流程的作家。这样的文学写作,很不同于那些轻浮的欣喜颂扬和无根的游戏写作,是将自己的文学写作绑定到积极推进社会变革和理想追求目标上的写作,明显具有现实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蕴含,具有对人的命运情感的真诚关切特点。

最近,我又读到杨文学的长篇报告文学《“太阳”梦》。这是杨文学又一次行走于中国大地之后的用心观察和真诚文学书写,非常及时和真实地将中国梦的主题同当下的社会精神价值和道德建设话题给予了个性表达。实现中国梦,让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当今置放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前进道路上鲜亮而富有魅力的旗帜。梦想就是目标,梦想就是希望,梦想就是动力,它正在强劲地助推着社会前进的车轮,也是唤起广大的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动力。可是,就像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会有坎坷,就像晴朗的天空会出现雾霾一样,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

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李玲修的名字于我是十分熟悉的。她的《笼鹰志》《足球教练的婚姻》和《奥迪迎面驶来》获得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当时包括黄宗英、陈祖芬、柯岩等在内的女报告文学作家群体中,李玲修都是非常突出的一位。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报告文学界的“常青树”,在年近古稀之年与资深乒乓文化研究专家王鼎华合作,又出版了一部书写国球辉煌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乒乓中国梦——走进蔡振华团队》。

与以往作品那些片段式案描述有所不同的是,这部43万字的《乒乓中国梦》无疑是迄今为止揭示中国乒乓球队最为全面、最为深入的一部报告文学。面对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乒乓球运动的三次巅峰崛起和众多蜚声体坛的风云人物,如何选择再现的视角和描述的对象,就成为一个个关键性问题。所幸的是,作者没有将作品写成“一人不漏、一事不落”的乒乓编年史或大事年表,而是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表现优势,将描写的重心聚焦于中国乒乓球的“第三次崛起”,即1989至2004年间,先后担任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和总教练的蔡振华率领中国乒乓球队逆境崛起、再创辉煌的历程。应该说,这样的选择既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要害,也在最大程度上契合着报告文学作为关注现实、逼近现场的非虚构文体的写作原则。作品通过“夺杯:临危受命”、“夺杯:拼死也要打翻身仗”和“保杯:捍卫巅峰荣誉”这样的三部曲经典结构,形象化地详尽演绎以象征冠军的“杯”为中心的“乒乓中国梦”的圆梦之旅。这其中,作者又重点叙述了“夺杯”与“保杯”的艰辛与壮烈,因为这是对夺得荣誉和捍卫荣誉的隐喻,是“圆梦”的实施和抵达。在重点描述“第三次崛起”之时,作者巧妙地用闪回方式追溯国球的历史,一方面让我们“鸟瞰”中国乒乓波澜壮阔的全景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重温其中的激荡与沉浮、酸甜与苦辣。这是一部国球发展的流变史,更是一部凝聚着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理想的奋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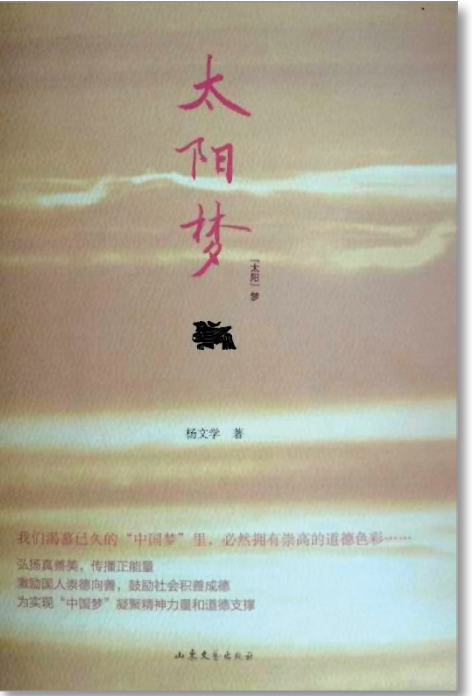
视角与对象的选择使作者有了足以凸显“乒乓梦之队”创世纪辉煌的资本,我特别感慨的还在于两位作者清醒的报告文学文体观。在写作中,他们强调要“真实再现”、“去伪存真”、“摒弃虚假”、“严守底线”、“尊重历史”和“完整表现”。我把这看成是作家对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严格坚守,而作者耗时3年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忍受疾病折磨成作为作品的言行举止,保证了《乒乓中国梦》不仅是作为文学叙述而存在,更是作为中国乒乓球发展的“信史”而存在。这不仅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其文献价值也不容低估。

当然,对于报告文学这样一种非虚构文体,仅有再现客观现实的叙述是不够的,还要有像余光中那样手握五彩笔绽放艺术华彩的高格。当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弱化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看重艺术性表达的《乒乓中国梦》则给予我们以新的信心。除却视角与结构等显示作家的特别用心之外,艺术性表达在《乒乓中国梦》中还体现在多个方面,譬如再现众多个性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精彩的细节描绘和场面设置,准确、灵动、简洁的语言等。

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梦的渴望殷切,对于大众幸福的未来有更加迫切的愿望,所以,作家杨文学以行走的姿态执著在追梦的路上。

作者在作品的开头写道:“道德如同一轮高悬的太阳,如果让雾霾遮住了它的光亮,那么,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温暖……”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社会今天的变化与进步,杨文学说,他在贵州、胶东、珠海、西柏坡、沂蒙山等地采访农民时,他们都说,“跟35年前比,日子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愁吃了,不愁穿了,有房住了,种地不纳粮了,上学不收费了,有病不用砸锅卖铁了……”可是他们却回避“幸福”二字。那么,是什么让这些民众在感受到生活负担轻松的时候,却不愿意说出“幸福”二字呢?究其原因,正在于人们对现实社会道德环境表现的不满。人们对那些不顾法制的约束以权谋私干部的贪腐情形、对那些突破道德底线不顾一切后果谋取钱财的掠夺行为、对于社会公益财产的分配不均、对于仁爱善行及孝道精神行为的严重失落、对于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生态状况退化等等,都十分的敏感和怨愤多多。所以,人们渴望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渴望法治尊严的生活,渴望和睦美满的人际关系,渴望仁爱孝行传统美德,渴望一切接近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到来,而不仅仅是物质的拥有。这也是杨文学再次行走调查和认真表达的目的和动力。因此,他的这部“太阳梦”,正是趋向光明和温暖的文学追梦过程。

作家可以看到和辨识社会生活天空中弥散的各种雾霾,但是,作家却不能完全驱除这些雾霾并使太阳的光热充分地流布人间。真正能够使道德行世的是圣贤者的规范和大量践行者的榜样作用。所以,杨文学在《“太阳”梦》中一头扎进生活的底层,在广大的乡村寻找道德的力量,他用很多感人至深的真实人物的高尚伟大道德行为描述,描绘出一幅绚烂多姿的道德示范和美好的人物形象。像坚持15年对患病妻子精心看护的农民大哥孙



百航,像对遭遇车祸而瘫痪的丈夫十多年不离不弃的“80后”女子李芹儒、像捐肾救妻的贾爱荣、像那位不幸失去了丈夫再嫁后继续照顾前夫的父母,还周全地照顾如今走“二门”的丈夫陈文敏及公婆的王秀燕、像那位自己并不富裕却依然在19年前自己60岁时开始照顾弃婴乐乐的农民陈贤如、像弱女子于晶和她的“爱心联盟”、“骑三轮车三千里送无腿女回故乡”的孟昭良以及为共筑和谐环境用心费力的淄川韩庄的老褚等很多人的各样故事,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的行为几乎都是足以惊天动地的大爱大仁大善故事,让人看了很难不感动、不铭记。对于这些大德善行人物心灵和行为的突出推举,是作家试图用明丽的精神道德之风,吹散弥漫于现实

■品鉴

真实还原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李朝全

铁流和徐锦庚携手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是一部深入踏勘往昔峥嵘岁月,打捞一段不该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往事的、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标志着两人的合作结出了新的成果。

要概述《国家记忆》讲述的这段历史,似乎很简单:在我党成立早期,一部错版的《共产党宣言》被青年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带到了山东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犹如一支火炬投入一片干柴,从此,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与抗争。这个题材新颖独特,作者又有诸多独到的发现和开掘。首先,这部《共产党宣言》竟然是历史上由陈望道翻译的最早的一个中文版本,而且书名还被错印成了“《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这本小说传承有序,确凿可信。作者引述党史等各方面专家经过审慎的考证,确定这个版本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其次,作者通过实地采访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延集村等相关当事人,广泛涉猎史料,发现了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发掘出了鲁北平原一段珍贵的革命往事,尤其是对早期加入共产党、参与大革命的众多人物的考证、挖掘与深入描写,丰富了鲁北革命历史或者山东党史的内容,努力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鲜活记录中华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段历史的政治革命的风云际会,塑造了一批为了农民解放、国家新生而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形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记忆》在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书写与开掘上功劳存焉,是对我党建党初期一段历史的可贵叙述与复原。

与此同时,作者并不囿于广饶一县或者刘集、延集一个村庄,而是将这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上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革命,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上。作者从党的领导人念念不忘《共产党宣言》落笔,概述了我们党早期领袖与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因缘际会,凸显了这部著作“就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立志拯救中国的一代有志青年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及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接着,作者力图还原《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所走过的“生命历程”:它是如何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又如何一步步地传播到全世界,在亿万万人心中激起共鸣与反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特别注意到了这本著作在今日的影响,它对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彰显了一部经典作品与日月同辉的不朽的思想光芒与精神魅力。因此,或许可以认为,作者的立意高卓,他们希望书写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的流传史、传播史,是其160多年来在全世界,包括中国、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广泛而长久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是《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传奇。或者换句话说,作者是将发生于大王镇刘集村、延集村的革命历史放到了《共产

生活中不少甚嚣尘上的失德恶行尘埃的积极努力,浓浓地表达着作家向善并积极纠正丑恶的心思,自然也体现出杨文学文学创作中的纯洁道德情愫。

在所有的文字记载中,足够的传说力量是最有生命和力量的文字。所以,神话永远流行。像精卫填海、女娲造人、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说,至今永远都有力量。这些故事是人们解释自然和希望实现自己愿望的努力,因为具有符合社会人类进步的蕴含而一直受到关注。杨文学不知是否从这些传统的文字表达中看到了传说的力量,但他相信真实动人的人物更具有感染力的力量,因此他的取舍就变得格外分明起来。《“太阳”梦》中不断聚集描述的大德大善、仁义至孝故事人物,确有一种从各个角度辐辏于呼唤现实社会生活道德建设,从文化精神上帮助中国梦实现这个大主题的作用。在积极的基础上很有流传的可能性。虽然在叙述的过程中给人有堆砌的感觉,又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不同内容表现而缓解了读者的这种感觉。美好的聚集会有一种绚烂的态势出现,给人更多的感染。

记得有人说过:“哪里有风险和黑暗,哪里就生成着解救。哪里有着不满,哪里就派生着渴望。”毋庸讳言,我们今天的道德环境很不令人满意。在物质和科技的强力进攻侵袭面前,人们的精神道德防线存在不少溃圯的地方。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在物质满足之时最为不满和忧虑的对象了。因此,及时坚决的道德建设和选择,是应当更重于物质和技术的获取。社会的风化程度,历来是一个社会良善的重要考核标准。大梦无常,人心难违。“太阳”梦也许使人不至于过分消沉,对于中国梦有积极的“点赞”作用。它会让解救危险和黑暗的希望与脚步更加坚定,使追梦的行为同太阳的光和热永久相生发展,不断地光照和温暖人间。

《“太阳”梦》,杨文学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党宣言》的传播影响史的大背景上来进行考察与书写,采取的是一种小中见大、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的创作方法。《共产党宣言》众所周知,但是它的“行走历程”,它的传播影响史,它对中国大地上的人们和事件发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恐怕都难以知晓。因此,铁流和徐锦庚以文学叙事为载体所做的这种梳理、总结、思索,富于启示意义。这是一本书与一个村庄、一群人之间所演绎出来的一段历史传奇,也是一部星火燎原的中国演义。因此,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故事。我们随着作者的笔墨,重温了党的历史,重温了早期领导人如何在黑夜中摸索寻找光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火炬引入介绍到中国,并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与城市点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这其中,一个个人物因为被赋予了思想,赋予了信仰、精神和灵魂,而鲜活生动起来,栩栩如生地站到了读者的面前。周恩来去世之前还在打听《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的下落,犹如一个巨大的悬念与伏笔,为后文发现早期版本及其历史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译者陈望道以及《共产党宣言》早期译本有关联的人物陈独秀、李汉俊等的命运沉浮、历史遭际也令人唏嘘感喟。与参与筹划出版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我党的早期党员李汉俊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望道一度亦曾脱党,并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但作为我党的“有功之臣”,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并被重新吸收入党,赢得了一个圆满的人生结局。《国家记忆》实质上是关于山东共产主义传播历程和农民革命的一种历史书写,刻画了一批鲜明的共产党人形象。

《国家记忆》文学性较好,可读性较强。作者善于运用情节和细节来描写事件,刻画人物。如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母亲给他煮了粽子,准备了红糖,他竟然蘸着墨汁吃了,还连声回答母亲“够甜够甜”,由此可见他翻译之专注与投入。而这样的趣闻轶事又是从义乌的民间采集而来,所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当然,作为一部重温历史的文学作品,《国家记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当今社会,忠诚与信仰重新变成了一个问,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社会话题。《国家记忆》通过表现一群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用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身上所焕发出来的精神光辉,告诉人们,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有理想的人生更有价值,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生活,重新树立起坚定的人生理想;要相信正义的力量,相信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参与到推动历史前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去。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铁流、徐锦庚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2014年6月4日 星期三

■书斋札记

胡冬林无疑是特立独行、极具个性的作家。这并不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长白山大森林里的见闻和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我们可以从专业书籍中得到,可以从采访、采风得到,甚至作为一个有求知欲望的游客也可能得到;也不是因为他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因为文学奖很多,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而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精神,那种深沉的浪漫精神。作家的心理状态,也是文学的重要元素之一。文字的背后是一个人。艾伯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把艺术批评主要坐标分为四个元素:作品、世界、艺术家和读者。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拘囿于那些作品,而是感受他的心灵、性格,然后再从这里出发去品味、思考文学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对胡冬林肃然起敬。

胡冬林和我们、和许多普通作家没有什么不同,面部暗黄,毫无光泽,说话声音也不太响亮,就像他那毫无特别之处的夹克衫一样,有些灰蒙蒙的平平淡淡的味道。要是在大街上遇见,说他是一个小贩儿或者是多年来一直没有熬上级别的公务员,比说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更可信。我很难把眼前的胡冬林和那个在大森林里写作的胡冬林联系起来。然而,这种鲜明的对比,又仿佛让人格外感受到了他那种心灵的力量。

胡冬林本来是城市人。他出生在长春,是“50后”。他的父亲是诗人胡昭,很小就写诗,被称为神童诗人。母亲陶怡据说鲁艺学雕塑的,那时也是省内颇有名气的女诗人,出过诗集。网上有胡昭纪念馆,有照片和简短的文字资料。从照片看,年轻的胡昭英俊帅气,是帅哥,意气风发。中年的胡昭是那种厚重、质朴的东北汉子,脸庞有棱有角,透露着坚毅的神情。晚年则颇凛然、沧桑而凝重,像是久经风雨的老树。在反右运动中,胡昭被划为“右派”。在随同父亲下放改造、插队落户的颠沛流离中,胡冬林与白山黑水结下撕扯不开的情缘。大山、森林变成了胡冬林生活的一部分。大自然把他们的生命融入了他的身体和灵魂,成为他生命中最坚硬的部分。这也是他的身体里父亲、母亲的诗性血液的流淌。胡冬林最初的散文创作就弥漫着浓郁的山野气息。他无法拒绝白山黑森林的魔力和频频的召唤,不断回返到那里去。1995年以后,只要有了点钱,他立刻就钻进长白山大森林里去。2007年,他干脆把家搬进了长白山下的小镇,过上了近乎山民的生活。他与猎人交朋友,在采蘑菇的一个大姐那里听故事,仅熊的故事就听了不下百余篇。他爬冰卧雪,闻雪香,辨兽迹,穿林海攀山崖,找到了野狼群唱歌的地方——狼歌台。他能辨识出许多野兽的行踪,他接近过许多我们听说过和没听说过的动物,如熊、野猪、星鸦、狐狸、山猫、水鸟,辨识各种蘑菇、植物和昆虫。多年来,他大致认识了187种鸟类,220种植物,70至80种蘑菇及30多种野生动物及两栖爬行类动物。他还在山林里找到了一张自己最得意的写字台,“一棵直径1.5米的大青杨的旧伐根圆盘当桌面,4截短原木枯横摆在四周当凳子,旁边立一根4尺高的原木,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短树枝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曾有几十个山里人把这里当成打尖的地方(有丢弃的垃圾),他们离开后,我找到了这里。每次来这儿都心存幸运和感激之情: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与星空,空气与河流;有时百鸟鸣唱,有时万籁无声;有时花香扑鼻,有时叶落纷纷;夏天有花果鼠在旁边偷看我写字,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积雪中打转……”

没有哪个人没有冲动,也没有哪个作家不怀揣着文学之梦,然而,这些冲动、梦想可能随时地就会被磨蚀、萎缩、干枯,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一地鸡毛。我们顾虑重重、瞻前顾后,没有能力让冲动、梦想达到一种炽烈如火的程度,没有能力让它们变成参天的大树、巍峨的高山、无边无垠的天空、辽阔的原野、汹涌的大海、狂风暴雨、闪电雷鸣。在我们的现实和文化中,有太多的日常经验和智慧,有太多的聪明,有太多的所谓理性的计算得失的方法,却缺少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任意的冲动,缺少尼采所沉迷的酒神激情,缺少那种凌空飞舞、独步高空的特立独行。然而,胡冬林却做到了。他是一个有风暴的人。胡冬林在《拍溅》里曾引用因纽特人的民谣:“在远古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高兴也能变成/人/因为我们讲着同样的话语/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他变成了大山和森林,大山森林也变成了他。这种沉迷山林的心灵,与其说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毋宁说是深入人心、张扬灵魂。“这座森林于我是创作源泉,心灵寄托,神圣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新鲜空气,最清澈的水,最美的野花和蘑菇,最动听的鸟鸣,最纯粹的森林音画……”我想,在胡冬林做出这种投入山林的选择的时候,在他无数次踏进山林的时候,在他的小屋里创作的无数个夜晚,他的灵魂一定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狂喜和高潮,也一定经历了无数次对世俗社会的孤独对抗和狂傲的蔑视,也一定会昂扬着那种激情四射的冒险意志,生活冒险和文学冒险。与其说他走进长白山是在观察大自然,毋宁说他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流浪、求索。

据我看来,生态文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怀有生态责任和生态使命的文学,它关注现实的生态状况,揭示生态问题,呼吁社会保护生态,保护家园;另一种则更靠近文学,近乎纯文学,更关心人性、心灵问题。前者是新兴的,后者则非常传统,比如沈从文等人的创作。但是,两种类型的根源,都应该是浪漫主义文化。胡冬林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生态文学作家,背靠牢固而正确的生态意识的大山,他似乎更有信心,但是,我宁可将他当成是一个头戴栽进山林的浪漫主义诗人,生态文学仅仅只是更大的浪漫主义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让文学承载任何现成的主义,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浪漫主义精神却是文学事业的常青之树。胡冬林的冒险选择,更接近浪漫主义的深邃,更像浪漫主义作家的姿势。在浪漫主义庞大家族中,那些桀骜不驯的作家大都蔑视世俗幸福生活,却极端迷恋那种傲然的精神自由。在他们看来,世俗幸福是虚假的,意义匮乏的现实,是捆绑、制约和压抑个人的枷锁,它把人拴在乏味、平庸的木桩上,昏昏欲睡,像那一头傻吃甜腻的家畜,必须打破世俗幸福生活的枷锁,才能高扬灵魂,创造出价值饱满的人生意义。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生活没有什么固定的结构,个体生命只能以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冲动、疯狂、痴迷等激情,不是魔鬼,而是一种灵感、才能,是上帝赐予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的最宝贵的财富,是精英者必备的品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浪漫主义势单力孤,犹如散兵游勇,而现实主义却像个庞然大物,无所不在。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学中有所改观,1980年代以来,浪漫主义像一条地下暗河,悄然流淌,尽管它产生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张承志是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张伟在《古船》之后也变成了浪漫主义者,他的《九月寓言》是“融入野地”,直到晚近的《你在高原》,则具有更浓郁的浪漫风格。如果宽泛地看,莫言也是浪漫主义者,就是先锋小说潮也可以当成浪漫主义,就是贾平凹也是一种浪漫风格,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的文坛一直没有理直气壮地把浪漫主义变成一种潮流,它仿佛总是含混而朦胧地存在在那里,我们的灵魂仿佛总是无法舒张、飘扬起来。和上述大作家比起来,胡冬林只是小人,但是,他的灵魂的炽烈也为当代文坛的浪漫主义尽了一份热力。

一个有风暴的人

——谈胡冬林的浪漫品格 □王学谦